

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



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长显

封面设计：魏天禄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一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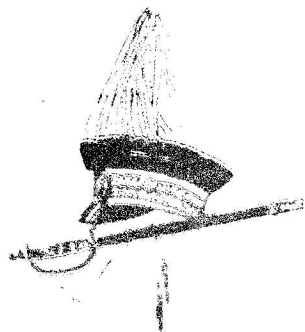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5.125 插页4字数362千
1982年8月第一版 198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900册

书号：11118·90 定价：1.38 元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一卷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七八二一·成都

目 录

1917年——1918年的护法运动

- 和西南军阀·····段云璋 1
- 西南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谢本书 王永康 25
- 西南军阀史的上限·····杨维骏 34
- 滇系军阀始末简述·····孙代兴 43
- 论唐继尧·····谢本书 77
- 评唐继尧的“联省自治”·····荆德新 108
- 领导护国运动的是什么政治力量·····杨维骏 123
- 论军务院·····林 荃 153
- 刘显世与袁世凯
- 评刘显世参加护国运动·····顾大全 167
- 试论周西成及其对贵州的统治·····范同寿 182
- 略论王天培·····张英志 203
- 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概况·····胡克敏 218
- 论陆荣廷军阀政权·····莫 杰 257
- 桂系军阀陆荣廷传记·····韦瑞霖 277
- 桂系军阀元老岑春煊·····袁少芬 298
- 沈鸿英传略·····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桂系军阀》资料组 313

谭延闿与湖南军阀·····	杜迈之	324
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与湖南		
人民的“驱张”运动·····	成寿焜	354
护法之役川滇黔军阀进行的		
权力斗争·····	张惠昌 陈祖武	379
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	匡珊吉	392
军阀割据混战与四川农民·····	黄淑君	407
军阀刘湘的财政搜括·····	黎 民	430
范绍增·····	陈章文	455
研究四川军阀史的一些基本问题		
·····	四川军阀史研究会	468
附录·····		476
编后记·····		479

1917年——1918年的护法 运动和西南军阀

段云璋

1917年——1918年的护法运动，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力量对封建买办势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战斗，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搏斗。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等人不畏艰险、坚毅不屈地讨伐北洋军阀的精神是可贵的；联合西南军阀对付北洋军阀的策略也应历史地加以理解，不可一概抹煞；而且，事实上孙中山等人不断接受教训，提高认识，同西南军阀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这些，既符合时代潮流，又促进了孙中山这批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但是，过去史学界对这场斗争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或者单纯地强调孙中山等人对西南军阀抱有严重幻想的一面，这是不全面不恰当的。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诸同志。

—

辛亥革命后，由于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段祺瑞、张勋等的疯狂反噬，造成“约法毁灭，国会废弃”，

“僭窃继起，叛变屡作，国无宁日”的政治局面。^①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这个帝国主义的共用工具死去以后，中国便从表面统一转而为公开分裂。这时，新旧军阀，割据混战，“政争兵乱，无年无之。”^②广大人民遭受着空前深重的灾难。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由于这时共和国思想已深入人心，特别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迅即失败，逼使共和国的敌人，也装扮成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他们把臭不可闻的封建专制主义乔妆打扮，力图在假共和的招牌下复活起来。这样，就使得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对于当时发生的如此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有一个通过实践，从不了解到逐渐了解、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逐渐提高认识的过程。

袁世凯垮台，黎元洪继任了总统，喁喁望治的人们“欣欣然有喜色”，以为黎元洪政府将“遵守法律，巩固共和”，国家将必安定，纷扰时局将必结束。孙中山也认为今后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来迅速实现建设好国家的夙愿。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孙中山对北洋政府“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不“重陷天下于纷纭”的寄望，证实和扩大了他的疑虑。广大人民也深感失望，义愤填膺。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通电，谴责军阀们争战不已，使得“商业阻滞”，呼吁迅筹对付办法。^③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农民，则日益蓬勃地开展争生存的自发斗争。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情绪，在当时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行中，得到特别鲜明的反映。他们惊呼“袁世凯复活”，必须

① 《军政府公报》第三十八号。转见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以下简称《史料与史学》），第26页，台北，1975年版。

②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见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页。

③ 《国民公报》1917年7月1日，藏重庆北碚图书馆。

“急以血刃铲除”^①。希望国民党人重建军旅，“削除此自古与国家绝对不能两立之叛将骄兵”，否则，“一切理财治军兴学殖产，均无从谈起；一切国会宪法新政法理，皆属戏言”，不仅共和政体不能存在，国家亦将不能生存下去。^②在日本的四川留学生同乡会在其敬告全蜀父老昆弟书里还坚决表示：“为国法国体而战”，“当不惜牺牲一切，务使达到吾人目的而后止。”^③军队中的民主派如滇军将领张开儒等也通电要求挥戈北上，讨伐叛逆。

孙中山就是在这样一种举国骚乱、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揭举起护法义帜的。

从1917年5月起，孙中山从段祺瑞一伙围绕参战问题所制造的一系列风波中，感到大局岌岌，不可乐观，他放弃了原定周游各省、考察实业状况的计划，开始筹画护法事业。他说服因不满北洋军阀横行霸道、由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来到上海的海军舰队首举义旗，并于六月初两次致电西南各省都督、省长，指出：

“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呼吁他们“作民保障”，^④誓师护法；同时，通知党员作护法准备，函促华侨赶紧筹募军饷。7月中旬，孙中山、程璧光率领舰队到达广州，在北方的议员也纷纷应邀南下。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于是，一场以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运动正式揭幕。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运动？在孙中山当时发表的宣言、命令、谈话和函电中，多次作了阐明。概括言之，是基于以下几个

①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载《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②陈独秀：《时局杂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③《国民公报》1917年8月30日。

④《全集》第三册，第451~452、547页。

方面：

第一，坚决维护主权在民这一最高原则。他指出：国会和约法，虽有不足之处，但约法的主旨是要实现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会贯彻这一原则的合法机构，是共和国存在的象征。“皇皇国会，为全国人民之代表，国会曰可，即主权者之所可；国会曰否，即主权者之所否。”而当前国家之所以如此“民不聊生，国无宁岁”，“皆被武人不承认人民主权之一念为之也”。因此，他誓志“以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即还我人民主权为职志”，^①“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②决不能听任国会解散，约法毁弃，以致“数十年革命事业之成绩”“全被推翻”。^③

第二，坚持法治，反对人治。他说：“国家治乱，一系于法”。^④“共和国家，首当守法”，而废弃国会约法，就是恢复昔日君主专制国家的“因人而治”，军阀们可以藉此“以天下自私”，以个人私欲代替法律，势必无法无天，恣所欲为，弄得国难频仍，民生多艰。他说：“综过去六载之混莽，何一非在上者弁髦法纪之厉阶。”由此可见，“国法不容妄干，而人治断无由再复也。”^⑤

第三，要迅速谋求国家统一富强，使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孙中山认为民国成立几年中，大乱不止，使得“国本飘摇，民力凋敝。”他之所以召集非常国会，组织军政府，目的之一在于挽救“垂绝之国脉”。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我们应趁机迅速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富强。“一旦战争告终，列强视线

① 《军政府公报》第十号，见《史料与史学》第255～257页。

② 《全集》第一册，第825页。

③ 《全集》第三册，第451～452、547页。

④ 《军政府公报》第四十九号，见《史料与史学》第261～262页。

⑤ 《军政府公报》第三十八号，见《史料与史学》第260页。

咸集于东方，及今不谋巩固国本 何以图存！”^①因此，他号召全体国民和护法将士“速图戡定内乱，回复平和，使法治之效，与并世列强同轨，庶足以生存发展，保此民国亿万年无疆之麻”。^②

第四，为给人民谋求真正幸福与和平的真共和，反对假共和。当时，段祺瑞“以假共和之面”，“行其专制之手段”；张勋之流把人民反对帝制歪曲为“南北之争”；一些政客、武人以“调和”为名，反对武装护法；康有为一伙更贼喊捉贼，“杂举时政之失，皆归罪于共和”。^③孙中山力辟上述种种谬论，指出这场斗争决非个人权位之争，或者南北地域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④段祺瑞之流“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的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专制、主张复辟的”，所以，“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想，国家才得永远太平”。^⑤他深信全国人心军心“趋向共和”，“南方若有依法组织之政府，则四海归心，伪共和断无反抗之能力”。^⑥他还针对当时国内反动派乃至一些国民党人攻击他争当总统等无耻谰言，一再凛然表示，他准备随时让位给真正坚持共和国的贤者，或者功成身退，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者的风度和情操。

毋庸讳言，孙中山的护法主张，缺乏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没有提出实行这一主张的正确途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它不是根本解决当时中国时局的有效办法。然而，我们对于这段斗争历史，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① 《军政府公报》第四十九号，见《史料与史学》第261～262页。

② 《军政府公报》第三十八号，见《史料与史学》第260页。

③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④ 《全集》第二册，第377页。

⑤ 《国民公报》1917年8月15日。

⑥ 《国民公报》1917年8月30日。

决不能苛求于前人，而低估它的战斗性和进步意义。

当时，长期压制中国人民的封建专制主义，仍然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它时而以赤裸裸的封建帝制复辟出现，时而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①从袁世凯旨在保证袁氏天下亿万斯年的《天坛宪法》，到保证段祺瑞之流专制独裁的修正宪法，都是往昔封建主义的翻版。他们通过威逼利诱等卑鄙手段所拚凑的伪国会，不过是奉行他们独裁意志的工具。他们的胡作非为，更是公然践踏国家主权在于人民这一共和国最高原则，造成了国家长期混乱、人民苦不堪言的局面。这是和辛亥革命后奔腾不息的民主潮流背道而驰的，也阻碍和压抑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要求迅速发展的趋势。因此，反对军阀黑暗统治，反对旧的专制主义，要求民主和科学，是这一时期人民斗争的主要内容。当时农民阶级固然不可能提出新的斗争目标，就是工人阶级也还没有作为自为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未能提出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小资产阶级曾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大声疾呼过要“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②但是，在本文讨论的时间内，就具体政治理想来讲，谁也没有提出过通过什么更具体的“新径路”，创造一种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蓝图的“新生活”。当时深受《新青年》影响，十分崇拜李大钊、陈独秀的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时，也只是认为须从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旧中国思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1~292页。

②李大钊：《新的！旧的！》，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着手。他虽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产生怀疑，但还是希望中国出现“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①在行动上也还处在一般感性的反帝反封建阶段。到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三点解决时局的办法。第一点是“当排斥武力政治”，因为“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和孙中山坚持的护法主张有一致处。但第二条“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第三条“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则显系泾渭不分，还不如孙中山同时候坚持的护法主张那样明确和坚定。由此可见，孙中山领导的1917年——1918年护法运动，虽然由于其本身具有必然失败的严重缺陷和局限性，但应该看到：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仍在先进人们心目中占着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先进人们追求的政治目标。而孙中山在当时那样一种夜黑似漆、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坚决打倒军阀、维护共和国，为人民争民主，这是民主主义思想高昂的表现，是贴合于当时正在奔腾前进的民主潮流的；而且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

正由于这样，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的欢迎和拥护。当海军护法的消息传到广东后，正苦于桂系军阀残暴统治的人民“于举国阴霾沉雾之中，忽睹霹雳青天之象，群情欢跃，莫可名言”。在长堤东园召开全省各界欢迎大会时，“数逾数万”，“爆竹声、万岁声、鼓掌声，檐宇为震”。各界代表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为之感泣”。^②

^①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78～79页，1957年版。

^② 《醒狮光复国记》第四章。

二

要护法，就必须解决依靠力量的问题，这是孙中山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后来人们常常责备他的问题。

孙中山当时的抉择是：以广东为护法根据地，主要依靠西南军阀力量来反对北洋军阀，而没有认识到必须依靠日趋觉醒的工农力量。这确是一个历史错误。但这种错误之所以铸成，却应从当时形势和阶级力量配备中去寻找。

北洋军阀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主要代表，是在内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敌人。孙中山联合与这个主要敌人有矛盾的西南军阀去反对主要敌人，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对斗争形势有无清醒的估计，和他们自己是否有充足的力量。

由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采取分割统治的政策和中国落后的分散的自然经济状况，使得当时的中国具有滋长军阀割据的土壤。辛亥革命失败后，旧的军阀势力固然恶性膨胀，而曾经跟随孙中山闹过革命的许多人，也在掌握军权、政权之后，迅速蜕变为新官僚、新政客、新军阀，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揭露的：“满清季风，俗靡风颓，……洎乎民国，绵绵延延，滋蔓日广。”结果，许多革命党人“多与旧官僚相通，或且变本加厉，每况愈下”。^①西南军阀多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和北洋军阀在拥兵、据地、盘剥百姓等方面有共同性，但他们的阅历与地位又和北洋军阀有所不同。他们不像北洋军阀源远流长，长期公然与人民为敌，而是辛亥革命后逐步形成或者正向军阀转化的军阀势力；他们多数和革

^① 《国民公报》社论，1917年7月4日。

命保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滇系军阀唐继尧、川系军阀熊克武等都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反对过张勋复辟。桂系军阀虽出身绿林，缺乏鲜明的民主革命意识，但也在辛亥革命高潮中附和过革命，在袁世凯政权行将垮台的情况下，被迫宣布过“独立”。而且，他们当时正受北洋军阀的歧视和排挤，力谋自保，对段祺瑞政府武力统一南方的政策采取某种对抗形式；而同孙中山则一直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并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对护法运动持着亲疏不等的态度。在西南军阀内部也因利害不同而不断发生矛盾和互相倾轧。这是一幅多么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情景！要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认识清楚，只能说是一种苛求。同时，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确是缺乏力量。护法运动开始时，孙中山原有的中华革命党军队已所剩无几，又无地盘可据。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渴望终止军阀的黑暗统治，但他们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还很弱小，有的甚至还刚刚产生。这就使得他们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特别是对称霸一方的军阀倚赖较深。所以他们的政治觉悟同他们的先进代表还保持着相当一大段距离，未给予护法运动以大力支持。几年后，孙中山在《复沪商界书》里还慨叹：“国之人从事实业者，惟知日适己事，而以国政付之武人政客之手，致民治无由实现。”^①当时的工人、农民自发斗争虽在增长，但其斗争规模和水平，都还未达到影响和推动孙中山转而依靠工农的程度。因此，与猖獗一时的反革命力量相较，人民革命的力量就显得相对地弱。幻想是弱者的命运，孙中山等在这样一种力量对比悬殊而又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在区别真护法与假护法、该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上，认

^① 《国民公报》1922年9月24日。

识不清，抱有幻想，是可以理解的。

十分可贵的是，孙中山在坚决讨伐北洋军阀的同时，对西南军阀也是坚持原则，不断提高认识，清除幻想，进行了斗争，而且是具有谋略的。

这种斗争首先表现在可否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的问题上。

孙中山曾经欣然认为：“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①然而，孙中山要在广东建立护法军政府，一开始就遭到盘踞在这里的桂、滇军阀的明拒暗挡。以“两广王”自居的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握两粤全部之实力”，“以湘为附庸”^②隐然南方一霸，而以广东作为他们的霸业重心。因而他们极力排挤其他异己势力，更不愿有一个护法军政府安放在他们头上。据当时段祺瑞的密探马风池的密报说：陆“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③所以，他一开始就反对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托词拒绝与孙中山的特使胡汉民商谈护法大计，嗾使其部属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于孙中山来粤前宣布两广暂行自主，宣布只是不承认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的内阁总理合法地位，但仍尊奉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为总统。与此同时，桂系军阀的代理人、并受到政学系拥戴的旧政客岑春煊，接受冯国璋厚赂，在上海“任调停，其实为北方缓兵计”；^④他还指使其党徒在他们所办的上海《中华新报》、《大新闻报》上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孙中山策划护法是“轰大炮”；并拉拢海军，企图抢在孙中山前面赶到广州，力阻孙中山赴粤建立军政府。

①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

② 《马风池密报》，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一期。

③ 《马风池密报》，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一期。

④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50页。

为打消孙中山“先在粤建政府之议”，①岑还同黎元洪的秘书长丁世峰和陈炳焜密商过一个联合西南六省实行割据的计划。号称“西南王”的滇系军阀头子唐继尧正踌躇满志地囊括滇、黔两省，垂涎四川。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阳示赞成，假惺惺地表示：“愿悉索敝赋，勉从诸公之后以拥护约法者”，以武力作为护法后盾；②而暗地里对孙中山南下护法竭力阻挠和破坏。当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通电拥护孙中山时，唐大为恼火，斥为“乱说”，电责张开儒“言太激烈，有损无益，以后应特别注意。”③

在孙中山坚持努力下，军政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宣告成立，但西南军阀多采取不承认主义。陆荣廷、陈炳焜等连续发表通电、谈话，不同意在广州“另设政府”，④扬言：“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拒绝为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提供经费。⑤唐继尧也拒不接受元帅职务，并且责怪孙中山办事“唐突”，但又考虑到“有彼（按指军政府）在，对内对外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即企图利用军政府作为对北洋军阀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他认为“无庸积极反对”，并将此意密告桂系军阀。⑥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的军政府各部部长，也多不愿或不敢就职，使得军政府一开始就陷于窘境。但孙中山志不稍屈，他满腔义愤地谴责陈炳焜对军政府“嫉视甚深，百端阻挠，力谋破坏”，指出“爱国国民，失所趋向，时局至今混沌，咎谁属乎？”⑦

①《马风池密报》，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一期。

②唐继尧：《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37页。

③《云南档案》。

④《程璧光殉国书》第四章。

⑤转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28～29页。

⑥《云南档案》。

⑦《全集》第三册，第513页。